
与国家的妥协

——新自由主义者和新左翼——

周 晓

(Kate Xiao ZHOU, 夏威夷大学)

本文试图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转型期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左翼和右翼均主动致力于把自己和历来作为国家附庸或批评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拼命与之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双方特别是左翼，则又不得不作为国家的批判者而行动。

面对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时背负着毛泽东中国的重压，新左翼知识分子在政府内外持续性地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发挥着不均衡的作用。

为考察新知识在现代中国形成的背景，本文从区域和全球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此处主要采用产生并形成了中国新左翼和新右翼之议题的国际间的分析路径。在这种场景下，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1、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曾影响并重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2、由于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美国的教育制度也对新左翼产生了影响。

在讨论了全球性背景对新左翼、新右翼形成的影响之后，本文不仅要讨论新左翼引起的新威胁，还将讨论新自由主义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例外，新自由主义者成了政府的啦啦队，并形成了支持国家经济计划的惯例。因为此种缺乏批判性的作用，在人们之间便使得自由主义趋于衰弱，其结果反倒是在人民中间给予了新左翼以更多的正当性。

截至目前，自由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业绩。向私有制和一般市场经济的推进颇为出色，如同翻译哈耶克（Hayek）及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著述那样，欧洲启蒙主义概念的引进，培育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使得朝向旧左翼的复归变得难乎其难了。尽管他们并不相信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新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脱离了民众的心情。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不承认唯有新左翼才关心有关环境、巨大的收入差距、官员腐败、就业保障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者的解释是，毫不犹豫地推进市场逻辑，市场一旦完全发挥其机制，便可指望其次要的消极影响趋于消灭。

然而，新左翼人士因成为针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胡鞍钢（Hu Angang）和王绍光（Wang Shaoguang）成了维护中国穷人及未能受惠于政府政策的人们利益的代表性的发言人。他们对以贫困地区为牺牲，向富裕地区倾斜的政府政策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富于理性。那么，新自由主义者的弹药能否成为葬送反对自由主义的新左翼的武器呢？

新左翼人士大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新左翼的影响，由这个事实看来，中国的新左翼正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人工堕胎合法化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尚是新的制度，归根到底，新左翼也许会从根本上弱化市场经济之自由

的基础。

这并非耸人听闻。

本文最终将从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翼出发，讨论市民社会建构的问题。